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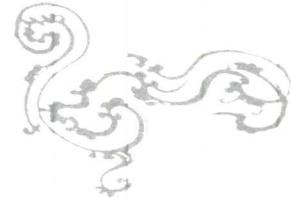
旷世大儒

——孟

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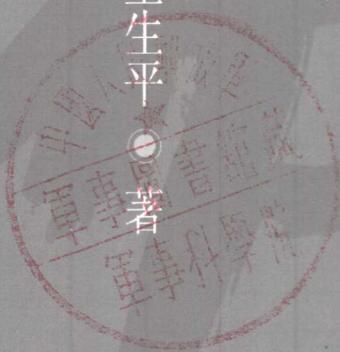
王生平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旷世大儒——孟轲

王生平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世大儒——孟轲/王生平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  
(旷世大儒)  
ISBN 7-202-02704-6

I. 旷… II. 王… III. 孟轲-传记（约前 372～  
前 289） IV.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1908 号

---

丛书题 旷世大儒  
书名 旷世大儒——孟轲  
作者 王生平 著  
责任编辑 李大星  
美术编辑 马少华  
封面设计 李颖明  
责任校对 张三铁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44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202-02704-6/K·664  
定 价 11.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写 在 前 面

在 2000 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 2000 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利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公子韩非，曾在《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有说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

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入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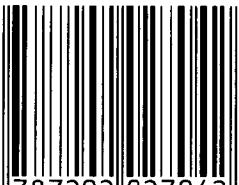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责任编辑  
封扉设计  
美术编辑  
责任校对

李大星  
李颖明  
马少华  
张铁

ISBN 7-202-02704-6



9 787202 027042 >

# 目 录

<b>引 言</b>	[ 1 ]
<b>第一章 进学赖三迁 慕贤定一生</b>	[ 4 ]
(一) 慈母严师	[ 4 ]
(二) 私淑孔门	[ 8 ]
(三) 辩辟许行	[ 11 ]
<b>第二章 诉空位而超越 立“仁宅”则无敌</b>	[ 18 ]
(一) “师道”与“王道”的张力	[ 20 ]
(二) “圣”“王”的“周期” “天机”	[ 24 ]
(三) 当仁不让于师	[ 32 ]
<b>第三章 乐天以知命 生生而不息</b>	[ 38 ]
(一) 人生莫测	[ 38 ]
(二) 命运可知	[ 42 ]
(三) “乐莫大焉”	[ 46 ]
<b>第四章 食色非人性 善恶有文野</b>	[ 54 ]
(一) 见死不救	[ 54 ]
(二) 人性论	[ 63 ]
<b>第五章 话语/权力 道统/天下</b>	[ 71 ]
(一) “予岂好辩”	[ 71 ]

(二) “何必曰利”	[ 77 ]
(三) “言近旨远”	[ 80 ]
(四) “术不可不慎”	[ 85 ]
(五) 儒家之言	[ 87 ]
<b>第六章 无情非君子 有朋远方来</b>	[ 92 ]
(一) 圣人亦有情	[ 92 ]
(二) 情之所钟 正在我辈	[ 95 ]
(三)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 100 ]
<b>第七章 夜气谓之何 仁端可当也</b>	[ 114 ]
(一) 难解的概念	[ 114 ]
(二) 从整体上理解	[ 119 ]
<b>第八章 战兵乎战德 求仁或求利</b>	[ 123 ]
(一) “道不同，不相为谋”	[ 123 ]
(二) 莫“执一”	[ 128 ]
(三) 战之“仁义”	[ 135 ]
<b>第九章 井田斯远景 农桑乃小康</b>	[ 141 ]
(一) 理想创造现实	[ 141 ]
(二) 着眼小康	[ 146 ]
<b>第十章 华夏风流 浩然气长</b>	[ 160 ]
(一) 落叶归根	[ 160 ]
(二) 身后泽被	[ 161 ]
<b>后记</b>	[ 173 ]
<b>附录一：参考书目</b>	[ 175 ]
<b>附录二：孟子年谱</b>	[ 176 ]

# 引　　言

在今天，人们都知道孟轲是儒学大师、文化名人，“孔孟”连称也习以为常，并且对于他们的肯定也多有认同。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历来如此，总是这样的。

孔，孟，原为单称。孔孟作为复合词，是历史的牵合。从战国到秦，到汉、魏晋，孟子的名声、地位都不高。司马迁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作《史记》已从“世家”与“列传”的落差上拉大了孔、孟二人之间的距离，且只给了孟子寥寥数语，孔子则大写特写。东汉王充把孔、孟拉近了，但《问孔》、《刺孟》却是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几个朝代过去，到唐代韩愈出来，孟子才被嵌进“道统”的系列，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与孟子的“出山”对应的是孔子被封为“文宣王”，贞观四年（公元631年）各州县建立孔子庙。又过了诸多春秋，到宋代，孔孟的著作具有了极高的权威性，《论语》与《大学》、《中庸》成为士子的考试教科书。于是，孟子圆梦，配称“亚圣”，其地位基本固定下来。

无论孟子的名气多大，也不管儒家士子、官方大员把他的地位抬得多高，又无论有多少一丝不苟且学富五车的考据大家，却始终没能弄清楚孟子的父母姓名谁，说不准孟子的老师是谁。除非将来有地下文物出土，否则这千古之谜仍沉埋于历史的迷雾之中。难怪乎权威而严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在孟

子辞条下还写着“生卒年不详”。让《孟轲传》带着无传主父母名、生卒年、老师的缺憾与读者见面，于心何忍？然而，无可奈何，只好安之若素了。

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重宗法血缘关系的儒家传统中走出来，也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意义出现，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自白”：“像我这种类型的人，一生中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而不在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sup>①</sup> 对一个科学家如此，但对一个思想家不能仅限于此。因为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在于他对于与他共在的世界的关系，在于他的思想之矢对于这个世界的穿透力和影响度，在于他的文本和后来人们诠释的张力，在于其人格、文章、语言的魅力。而这一切无不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息息相关。大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是伴随着其思想被历史选择的漫长绵延。欢迎是选择，拒绝也是选择。在欢迎和拒绝的二律悖反中，排除了无动于衷的中性麻木，激活了和激活着人们的接受力，同时，也就有了思想家“不在场”的交流和对话。

史家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怕。真的惧怕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话语确乎使贵为皇帝的朱元璋恐慌，而承袭了浩然之气的文天祥，写作了《正气歌》，使元世祖受到震慑。汲取了《孟子》精华的元稹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传世名句。孟子在世时，好与人辩；不在世后，人与孟子辩。在这个意义上，“争议”使人延续生命、扩展思想。这就是思想家的“不朽”。相反，一潭死水，了无生机。

面对孟子，人们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本

---

<sup>①</sup>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传要说的，前人和时贤基本已经说过，因而不少内容是重炒冷饭。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如此，也可加深印象，重复一遍，抑又何妨？不过，在文本与诠释之间，由于主笔者各各不同，前见沉淀下来的差异所在难免，本传的面目当然不会与同类的书完全雷同，正如《宋·苏轼传》的官方写本与苏辙的《栾城集墓志铭》兄弟印象不会完全相同一样。本传力图“写形传神”，但能否达到预期目的，那就只能交给读者和方家评论了。

鉴于正史关于孟子行踪、事迹、出身、经历十分草简，而言论、思想又过分繁多，我只能在给定的格局下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史简我也简，但非照猫画虎；理多评也多，但不拟支蔓繁琐。只要能围绕孟子的神采、魅力这个轴心取舍材料，统摄到现代语境中，本传的任务就大体完成。至于其他聚讼不已的纯属考据的东西，这里不再展开。这也是考虑到思想传记不是考据这样一个特殊规定的缘故。

# 第一章 进学赖三迁 慕贤定一生

## (一) 慈母严师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伦理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雄辩家。历史上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的成功，发端于母亲的早期教育，延续在追随孔子思想的实践中。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孟母的启蒙和向导，就没有日后的孟子。儿子是伟大的，孟母更伟大。因为她调教出一位圣人。在早期教育成为一门具有可操作性工作的今天，出个把天才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二千多年前，重视并卓有成效地实施早期教育，不具有原生的创造性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

孟母的头一个自觉去做的，就是选择一个适宜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孟子诞生在临近坟场的地方。孟母认为这样的地方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为她看到儿子对筑坟挖坑的游戏十分着迷。于是搬家到闹市附近。时间一长，又感到这地方不行，因为小孟轲整天价学着商人喊买叫卖，煞有介事。不得已，再次搬家。这次，她满意了，因为附近是学堂。里面有知书达礼的先生，耳畔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母子定居的地方，就在今天山东省的邹县。这里距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很近。依照一般看法，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按孙开泰《孟子年谱》为公元前389年，本书采后说），

离孔子出生不过两个多世纪。学风淳厚，自不在话下。

孔子首创私塾，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大教育家。旧时的私塾挂有孔子的画像以示尊崇。但爬梳孔子的教育学说，并不见早期教育的内容，更不见选择适宜环境的思想。就选择环境以利儿童发展来看，应是孟母的独创。这件事表明，孟母首开妇女进行早期教育的先河。孟母通过切身经验，体察到环境对儿童的同化能力。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儿童，差的环境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孟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不嫌麻烦地搬家，无非是为给儿子营造一个她认为理想的人文氛围而已。自己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孟母第二个自觉去做的地方，就是在选择好的环境基础上，加紧言传身教。儿童天性，喜欢玩耍，缺乏自制力量。服从社会指令，克制自然欲求，不为物欲所动，就是建立道德意志、培养高尚感情的开端。小孟轲上了学，却身在课堂心在外，不好好读书。一次逃学，被孟母发现了。孟母把儿子叫到屋里，生气地用刀子割断了正在织的布，对小孟轲说：“你不好好念书，到头来，就像这割断的布一样，成为废品！”也许是响鼓不用重锤，打那之后，小孟轲再没逃过学。孟母的教育是向完美的精品方向努力的，她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因自己的疏忽留下一丝瑕疵。一次，孟轲问邻居杀猪做什么，她不经意地随口应了一句：“给你肉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来她并没有这个意思，邻居也没讲过这个话。但如果孩子吃不到肉，那无异于撒谎。于是她不顾手头紧，还是买了肉，兑现了诺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精心培育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孟轲结婚之后。一次，孟轲告诉妈妈，要休掉妻子。孟母问：“为什么？”答：“她违背了礼教。”问：“你怎么知道？”答：“我亲眼所见，她在屋里竟然盘腿坐着。”孟母说：“如果你看到这种现象，恰好证明你违背了《礼》。《礼》书不是

这样说嘛：‘将要进家，要问妻子在不在家；将要上堂，先要大声示意；进了房门，要低头看地。’你一定没有低头看地，否则如何能见妻子盘腿？”一席话，说得孟轲连连认错。古代的礼法，一招一式，都有刻板规定；举手投足，都不许有差错。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有一丝不苟，才能彬彬有礼。这种严格要求，对儿童的日后的成长，亟其重要。世界戏剧大师卓别林晚年写回忆录时，几次提到他准确优美的发音吐字，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无数次对他不正确语调的纠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孟母的教诲，使孟轲受益匪浅。这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史记》没有说孟子的老师到底是谁，只是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的弟子子思的学生。但子思的学生有多少，叫什么名字，哪一位在邹县从教，都莫衷一是，只好付诸阙如。能确定的，是他的启蒙老师母亲。有早期教育的事迹可查，也有孟子思想中打上的烙印为证。

《孟子》书中对个体所处环境的重视，对工作、学习不能心猿意马的警示，对处理好夫妇关系的关键因素的强调，以及对五种教育方法的阐释发挥，无不裹挟着母亲早期教育训诲和自己发挥的基础。孟子得益于家教，又把家教时获得的经验传授给社会，写进书里。写进书里，是为了传给后人；传授给别人，是为了扩大影响。《孟子·尽心下》写的“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使我们能追溯到孟子将要休妻时受到的母训。《孟子·告子上》讲述了弈秋的两个学生一个不好好听课、一个专心致志于棋道，结果大不相同的故事和“一暴十寒”的名言，使我们又看到孟轲逃学、母亲割机的身影。特别是孟母三迁的举动，更是铅灌铁铸般地融进孟子的心灵深处，成为他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从孟子对一位名叫戴不胜的人的谈话以及对齐王儿子风度的

赞叹等等，可以看到孟子对环境重视的程度。

谈话是围绕戴不胜怎样能使自己的君王上进求善展开的，分为两层。第一层，以学习语言为例，说明语言环境的重要。第二层，进入主题，说明道德环境的重要。关于语言环境。孟子说：“一位楚国的官员，希望儿子能讲齐国话，是找齐国人教，还是让楚国人教？”戴不胜说：“当然是齐国人。”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很多楚国人打扰，纵使每天鞭打，逼他说齐语，也办不到。但是，把他带到齐国的闹市住上几年，即便每天鞭打他说楚语，也会溜出齐语来。”这层意思说完，就讲要讲的中心问题：道德环境的营造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正如学习语言不能跟一个人学习一样。“你戴不胜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王宫中不分地位高低、年龄长幼，都是薛居州一样的人，君王是无法做坏事的；相反，宫中人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那大王又怎能做好事呢？一个人能把宋王怎么样呢？”（《孟子·滕文公下》）这个意思以后一直成为封建各王朝诤臣直吏谏疏君王的规矩方圆、金玉良言，包括诸葛亮《前出师表》中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的名句，也是如此。其实，孟子的思想中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孟子从范邑来到齐国都城，远远地望见了齐王的儿子，感慨地说：“环境改变气度，奉养影响气质，环境真是太重要了。他难道不是人的儿子吗？为什么就与众不同了呢？他的住所、车马和衣着打扮，多半与别人相同，为什么那么优秀呢？就因为他居住的环境使他这样的；何况以‘仁’为住所的人呢？鲁君到宋国去，在宋国的城门下呼喊，守门的说：‘这不是我的君主，为什么他的声音同我们的君主这样相像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环境相像罢了。”（《孟子·尽心上》）这段话与上述《滕文公下》中的环境论相得益彰，凸显了道德乃本体而非西方所谓语言是家园的华夏文化的特征（这一点后面还要专章详